



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

——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

朱 剑

摘 要: 我们正处于媒体交替更迭的时代。一方面,信息聚合型期刊数据库平台对学术传播渠道的控制、开放获取运动的兴起、国际学术期刊的“入侵”以及新兴实力集团的跨界而入,在使传统学术传播失序的同时,更加剧了纸本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综合性学报的危机;另一方面,由于期刊体制的严重滞后以及没有找到适合互联网特点的替代传统期刊的基本传播单元,互联网时代新的学术传播秩序并未形成。要构建互联网时代新的学术传播秩序,就必须改革期刊管理体制,推动学术期刊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转型以及体系化建设;学术期刊则应利用现行体制给予的学术传播主体身份,主动实现媒体融合发展,赢得改革的先机。目前,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思路已逐步明确,高校学报已经在行动,继联合打造“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之后,以“专域”为单元的大型开放互动学术传播平台呼之欲出,并有望打开通往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新秩序之路。

关键词: 传播秩序; 学术期刊; 期刊体制; 数字化转型; 开放获取; 专域出版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是中国当代学术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不仅是新千年的开始,更是纸本时代与互联网时代交替的开始。在此之前,纸本时代的传播秩序是“稳定”的。所谓秩序,“表示的是一种在服从或遵从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状态或情势”^①。行政权力对于学术论文的主要传播渠道——学术期刊的管控是我国学术传播秩序最为鲜明的特点:“社科期刊系统以纵横交织的管理系统和传播系统为中心,成为超稳定结构……在纵向管理系统中,期刊处于底层,在横向传播系统中,期刊处于中心。”^②管理的“底层”与传播的“中心”正是代表权力意志的期刊体制给予学术期刊的定位,“政府就通过对作为横向传播系统中心的期刊的管理达到动员资源、组织学术生产、管控学术成果发布,进而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目的”^③。“底层”与“中心”交汇点实际上就是学术传播秩序的基点,在期刊以外基本不存在官方认可的学术论文传播渠道的纸本时代,维护住基点的地位也就稳定了传播秩序。由此足见在学术传播秩序的构建中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如此构建的秩序看似稳定,但其内部却充满张力。这是因为,学术期刊因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产生,本应内嵌于学术共同体并成为其中心,作为学术生产主体的学术共同体理应是学术传播秩序的重要构建者,只有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学术传播秩序才是真正稳定的。但在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学术共同体不仅在学术传播秩序的构建中几乎未起作用,而且学术期刊也已与之相分离而外在于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从结构到布局均取决于行政权力

① 杨雪冬:《论作为公共品的秩序》,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

② 李频:《数字时代社科学术期刊改革路径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③ 李频:《数字时代社科学术期刊改革路径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的意志,故不可避免地与研究相脱离,体系化建设更是付诸阙如。这种情况在高校学报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学术共同体对传播秩序的遵从即对学术期刊传播中心地位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对行政权力无奈的遵从,而不是因为自身需要得到了满足,对于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现状,他们并不满意。因此,一旦行政权力所赋予的学术期刊的中心地位受到传统期刊体制无法制约的某种新兴媒体的挑战,传播秩序的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

改变始于世纪之交。首先,数字化浪潮汹涌来袭,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社科学术期刊的应对之策几乎都是将数字化传输交给了第三方——商业化期刊数据库。短短数年间,期刊数据库即已垄断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输,它在对期刊进行数据转换的同时也拆解了期刊,随着读者阅读方式由读“刊”到读“库”的转变,以及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传播中心正在从期刊向单篇论文转移,期刊作为唯一传播中心的地位不再。其次,不断推进的学术国际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大踏步进军中国市场以及大量优秀学术论文流向海外,也使得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国学术期刊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再次,对于高校学报来说,其所特有的结构问题随着世纪之交规模空前的大扩容而更加凸显,扩容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总量首次超过了千家,占据了社科学术期刊的大半壁江山,而新创办的学报基本是综合性和内向性的^①，“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甚至“学术垃圾场”等等来自学术界的各种批评和诟病之声不绝于耳,体制赋予学报的“中心”地位正在失去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凡此种可归结为一点就是,随着新的传播渠道的开辟,依靠期刊体制建立和维护的以纸本学术期刊为基点的学术传播秩序遭遇了最为严峻的挑战^②,学术传播的失序已不可避免。

显然,局部的修补已无济于事,在互联网时代重建学术传播秩序已迫在眉睫,重建秩序必将成为国家媒体战略的核心。本文将以高校学术期刊为中心,回顾和评论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以来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为学术期刊改革所进行的尝试,并为确定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提供一个思路。

一、构建新秩序：两个层面的初步尝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术期刊历史和现状的特殊性,决定了互联网时代中国学术传播新秩序的构建必定会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如果说,西方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和规模化、国际化发展,凭借其与学术共同体紧密关系和纸本时代打下的专业化、体系化、市场化基础以及宽松的体制环境,只需顺势而为的话,那么,中国学术期刊在转型时所必须面对的却是远比西方学术期刊复杂和困难的现状,必须逆势而行。

数字时代到来后,学术期刊虽然还是管理的基点,但新的传播渠道的开辟,使这一基点虚化了,传播失序正是因此而起,但根源还在体制的滞后。所以,重建秩序意味着必须在两方面同时进行建构。一方面,学术期刊必须完成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体系化建构以重建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这是纸本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期刊就无法真正进入数字时代。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期刊体制改革,现行期刊体制既难以维护传统学术期刊的地位,又不能促其转型,同时,既难以将国际期刊出版集团和新兴办刊主体拒之门外,又不能规约其传播行为,同样不适合数字时代。“改革不合理的期刊体制,无论对管理者还是期刊人来说,都既是还历史的旧账,也是为未来承担历史责任。”^③因此,唯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推动和确保传统学术期刊转型,没有体制改革,学术期刊转型的任何尝试都会在僵化的体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相应地,唯有体制改革才能将新的可能进入或已经进入的传播主体纳入体制认可的传播秩序之内。体制改革与期刊转型“这两场历史性变革的不期而遇已注定了它们的进程必然会交织在一起,单独地针对其中的一个,很难找到真正的应对之道”^④。

①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同时发布了学报应以内稿为主的政府文件,见《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教备厅[1998]3号;《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新出期[1998]109号。

②关于纸本时代学术传播秩序的建立及其遭遇的挑战,笔者另文专论。

③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④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应该说,随着传统学术传播秩序危机日益凸显,改革不合理的期刊体制与实现学术期刊的转型已逐渐成为政府部门与业界的共识,约从2010年开始,“由政府主导的针对中国大学学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及由学报界自发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继发生,共同奏响了大学学报改革的乐章”^①。在笔者看来,这也是管理层与业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分别尝试构建学术传播新秩序的开端。

(一)底层设计“1.0版”: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转型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底层。近十余年来,学术期刊是否应进行专业化转型和如何应对数字时代的到来一直是各种学术期刊论坛的主题。因此,早在自上而下的期刊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之前,改革的探索就已在学术期刊界开始了,其中,“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数字化产品,更提出了关于期刊改革的目标与路径的新理念。

1.“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缘起

世纪之交的大扩容后不久,教育部就意识到了高校学报的问题,在2002年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即以“全、散、小、弱”来概括学报现状,并提出了“专、特、大、强”的目标,为此,袁贵仁提议启动“名刊工程”,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简单地说,“上策”是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是各刊走内涵发展的道路^②。显然,“名刊工程”是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重整高校学术期刊的系统工程。

2003年底,“名刊工程”正式启动,先后有31家学报和专业期刊入选。“名刊工程”成效如何?王文军根据CSSCI数据对2006—2010年“名刊工程”综合性学报与综合性社科期刊和专业期刊的对比研究发现:“在所有学科,名刊学报的分学科影响因子均值都超过了综合性社科期刊前10名的均值。”“在专业期刊发展比较完备的学科……综合性名刊学报明显处于劣势。”^③显然,虽然“名刊工程”成效有目共睹,但因为其综合性,再优秀的“名刊”,也无法与专业期刊相提并论。叶娟丽在研究了王文军提供的数字后指出:“教育部19家名刊的最高数据均出现在2008年,这一现象的统计学意义就是,数据在2008年出现拐点”,说明“名刊工程”的“内在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当前学报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如学报结构、布局不合理而导致的学术影响力、传播力弱小的问题,没有涉及已成当今世界期刊发展趋势的数字化技术问题”^④。从袁贵仁提出的“上策”来看,“名刊工程”是“有心触及”这些问题的,但入选学报采行的几乎都是“下策”,而且已穷尽了“下策”。那么,既然有“上策”,何以不付诸实施?显然,“上策”束之高阁是因为有着无法突破的障碍。根本障碍是期刊体制,“一校一综合刊”已成既定模式,即使是教育部,在体制面前,仍是寸步难行。

与“名刊工程”止步不前的同时,期刊体制改革的风声渐起,从新闻出版总署的宣传来看,体制改革就是编辑部的“转企改制”,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问题的解决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因此,作为改革对象的“名刊工程”学报有必要以诱致性变革推动改革从实际出发并朝着遵循学术规律和学术期刊规律的方向前进。“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设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2.“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

2010年,笔者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建设性方案,主要内容是:(1)利用现有的“名刊工程”平台协同创新。(2)通过合理的组合,对各刊纸本发表的文章进行同步数字化编辑整合,打破校域界限,成立以各名刊编辑人员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创立《哲学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经济学报》等若干个以一级学科分类的数字化专业期刊,组成“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新型期刊群。(3)通过与期刊数据库的谈判与合作,改变其建库和传播模式,新创立的数字化专业期刊在期刊网

①叶娟丽:《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②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载《长沙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③王文军:《分学科评价:综合性学术期刊评价的合理路径——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综合性学报为例》,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④叶娟丽:《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上整体呈现,既可检索,更可全本阅读,从而加深读者对期刊的印象和归属感^①。显然,如何实现专业化、数字化和集约化以及建构高校学术期刊体系,如何因应期刊体制改革是这一方案设计的重点。这一方案得到了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多家综合性学报的认可,2011年3月,由其中的17家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共10种在中国知网以开放获取方式正式上线^②。

3.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意义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第一个关键词是专业化,应对的是学报多学科拼盘的困境。专业化转型,“实际上并非单个学报所面临的抉择,而是一个结构性、宏观性的问题。因此,在学报改革全局中,‘综合性与专业化’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机位置”^③。关于学术期刊专业化,学术界曾一再呼吁,学报界和管理部门也都有一定的共识,但以往都是将专业化转型建立在个刊的基础上,所以无法找到可行路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则另辟蹊径,通过共建共有聚合平台的形式完成集体的专业化转型。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第二个关键词是集约化,应对的是学报的封闭办刊和门户壁垒问题。平台建设必定是一个集约化的过程,“集约化的要义在于对有限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以获取最大的效益,而并不一定要把分散在各校的编辑部整合到某一高校或企业实体中去,现代化的资讯条件完全可以做到不受行政区划和管属限制的异地整合”。共建的数字化系列专业期刊“是高校的,却不再专属于某一校,故而是开放的”;以此为纽带,“名校之间的门户之见虽不能彻底破解,但名刊学报之间的壁垒可望就此拆除,名刊背后的名校的群体优势即可尽显”^④。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第三个关键词是数字化,应对的是学报的传播和发展困境。“专业化和集约化是历史遗留给学报的特殊问题,而数字化是所有期刊甚至整个出版业面对的共同趋势;专业化和集约化是有可能通过改革解决的阶段性问题,而数字化的挑战是长期的、严峻的。”^⑤“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方案的最终落实,就在于数字化。离开了数字化的支撑,一切都无从谈起。

概括地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改革思路就是“两分开”的办法。首先,将纸质学术期刊与数字化学术期刊分开。对于数字化而言,学术期刊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很少羁绊,可以通过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呼应,从容构建合理的数字化学术期刊体系。与此同时,原有的纸质期刊也可以继续存在。其次,是将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编研一体既是学术期刊的优秀传统,也是期刊学术生命力的源泉,编辑应该继续留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而出版发行则可交给大型出版集团或数字化网站^⑥。“两分开”是一条既尊重历史和传统,又切合高校实际、满足学术发展需要的改革路径。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在期刊体制改革前夜来自底层的一个设计,其实践探索彰显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意义。“这次制度变迁的动因,表面看是源于大学学报主编们对未来发展的深层次的危机感;但从本质上,它仍然是出于各位主编对自己生存利益的一次理性算计。因为,任何制度变迁本质上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⑦正因为出于理性,所以必定从现实出发,“不管最终会采取怎样的办法来实现学术期刊体制的改革,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必须将改革前体制中的人纳入改革后的新体制中去。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他们也就有不同的定位。如果新的学术期刊体系以另起炉灶的方式来建构,他们就是新体系必须甩掉的包袱;如果通过整合现有的学术期刊来构建,那他们就是新体系可以倚重的对象。显然,完全采用前一种方式,改革会十分简单,但却是不现实的;而采取后一种方式,改革会非常复杂,最根本的难题是:在不抛弃现有学术期刊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学术期刊的规模化、集

① 详见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②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网址为:<http://www.sju.cnki.net/sju/default.aspx>。

③ 桑海:《“视差之见”与跨越性反思——近期高校社科学报改革讨论述评》,载《文史哲》2013年第2期。

④ 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⑤ 桑海:《“视差之见”与跨越性反思——近期高校社科学报改革讨论述评》,载《文史哲》2013年第2期。

⑥ 仲伟民、朱剑:《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兼论高校学报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⑦ 叶娟丽:《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约化和专业化,以达到构建合理期刊体系的目标?”^①而这个“算计”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要证明,除了盲目“转企”以外还有着整合现有资源、面向学术市场、担当传播主体的更为稳妥、更为可行的路径。

在此,笔者要再次强调“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的时间节点:2011年3月,在这个时间点,关于报刊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尚在酝酿之中。可惜的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模式和“两分开”的理念并未被顶层设计所接纳。

(二)顶层设计“1.0版”：“市场化”与“转企改制”

1. 顶层设计“1.0版”之《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

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体制改革在正式启动前,已进行了声势不小的舆论准备。但改革的真正启动,则在201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意见》可谓对报刊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意见》首先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现行体制制约了报刊出版业发展,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深化改革。”^②可见,在对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非时政类报刊的现状评估和改革的必要性方面,顶层与业界有着一定的共识,但在问题的根源方面,两者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即使同时指向体制,所指也各有侧重,这从《意见》接下来阐述的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目标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意见》指出,改革就是在“行政推动”的同时,引入“市场运作”,实现“资源重组、结构调整,提高产业集中度”。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目标任务是:“分期分批按照规范的程序转制,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进行企业工商登记注册。”^③简单地说,就是“分期分批按照规范程序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使其成为能独立承担社会法律责任的市场主体”^④。显然,顶层认为问题的原因是体制没有赋予报刊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因此,寄希望于通过改革获得市场主体身份后的报刊能够自觉根据市场的需要,完成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从而做大做强。然而,业界特别是学术期刊界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将问题的根源指向期刊管理体制,认为《意见》设计的“路线图”,针对的只能是大众报刊,而不是“小众”的学术期刊。《意见》似乎也给人以对学术期刊另眼看待的错觉,它特别规定,对于“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⑤。

2. 顶层设计“1.0版”之《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2012年7月,“另行办法”终于出台,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其中,关于学术期刊的体制改革是这样规定的:“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对于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学报编辑部,并入本校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对于本校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但具备建立期刊出版企业条件的学报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期刊出版企业;对于本校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且不能转为期刊出版企业的学报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相同相近的专业和学科为基础,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⑥显然,这个“实施办法”并没有对学术期刊另眼看待,与非学术类报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将办法更细化了而已。按照这个“路线图”,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和高校学报都将“转企”。

3. 底层回应:业界的分析与批评

在《意见》发布前,学术期刊界对必将到来的期刊体制改革就已展开了热烈讨论。鉴于当时正在推进的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和“转企”路径,学术期刊是否要走同样的改革之路成为讨论中的重要问题。对此,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同改革者往往来自那些已主动进行市场化转型的期刊,主要

①朱剑:《我国学术期刊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兼论学术期刊改革的目标与路径》,载《传媒》2011年第10期。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2011年5月17日。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2011年5月17日。

④吴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攻坚号角已吹响——柳斌杰接受专访介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载 <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1006/201108/721385.html>, 2011-08-12。

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2011年5月17日。

⑥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载 <http://www.gapp.gov.cn/news/1303/87163.shtml>, 2012-07-31。

是极少数行业性的科技期刊。这些期刊在本行业中培养了大量的固定读者,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对于坚定的反对改革者而言,在学术传播的传统秩序之下,学术期刊尽管要承受来自体制的压力与束缚,但同时又受到体制的保护,是现行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坚持认为学术期刊的现状是完全合理的,高校学报的业绩是辉煌的,体制改革是没有必要的。他们更愿意通过对传统传播秩序的守护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对于试图改变学术期刊现状的任何尝试都予以强烈反对^①。

业界中的多数人并不否认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已陷入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困境之中,并且明确意识到改革是势在必行和不可避免的。这其中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体制改革,他们是理性的支持者,“在当下出版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高校人文社科学报要讨论的其实不是需不需要改革,而是如何深化改革,包括改革的方向与重点、总体发展目标、优势与不足,以及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与期刊市场关系、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建立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地去思考”^②。同时,他们又是理性的质疑者。他们强调,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僵化的期刊体制,特别是管理体制,如果进行体制改革,首先应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单纯地改变期刊人的身份,由“事业”转为“企业”不可能解决管理体制造成的问题。“不管哪一类高校学术期刊,其体制改革都决非转企与否那样简单……在布局 and 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之前,盲目地启动‘转企’必定使高校期刊陷入混乱。因此,体制改革的目标首先应该设定为通过对布局 and 结构的调整,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高校社科期刊体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什么样的手段最合适,应该放在这个目标下来考量。”^③

既然《意见》已经规定了对学术期刊“另行制定办法”,因此业界中的大多数人都寄希望于这个“另行办法”能从改革的目标、任务到路径、方法都能有为学术期刊量身打造的更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细节,即“另行制定办法”这段文字是出现在《意见》的第三部分“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所谓“另行”指的其实只是“转企”的具体“实施办法”,这就意味着让学术期刊成为一般的“市场主体”这一“目标任务”不会有何不同。

正是因为对这一细节的忽略,当总署《实施办法》发布后,学术期刊界最初的普遍情绪是震惊、不解和失望,继而起的是对这个文件的公开批评。虽然部分批评不免有些情绪化,但理性的声音还是主要的。除了“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以外,几乎全是负面评价。一个中央部委文件发布后立即遭到如此激烈的公开批评,在学术期刊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批评虽是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但焦点都在“转企改制”。“大多数期刊人对于变革虽有一定的预期,但并没有真正做好心理准备,更缺乏成熟的应对策略……当由政府权力部门发动的变革真正到来之时,特别是当《实施办法》破灭了体制改革会对学术期刊网开一面的幻想之后,管理部门与业界的分歧便清晰地表露了出来……无论是抵制、反对,还是怀疑、忧虑,其最初的冲动都是缘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从长远看,期刊人的利益是与期刊的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改革确实能带来学术期刊的大发展,那么,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期刊人只要应对正确,就应该能通过改革获得更大的利益。”^④因此,追求最大的公约数成为学术期刊界应对顶层设计的明智选择,这就是对期刊体制改革必要性和大方向的肯定,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改革设想,特别是具体目标和路径设计。其实,改革开放30余年中的许多强制性改革方略出台时几乎都遭遇过改革对象的反对和抵制,但大多没能阻挡改革的进程,关键的原因在于反对者没有提出更为合理和可行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一些在中央强制性改革方略出台前来自改革对象自发的诱致性改革往往容易获得顶层设计的吸纳,从而与顶层设计融合,在改革对象获得了可能的利益保护的同时,也取得了改革的成功。在学术期刊界,“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正是这样的诱致性改革。尽管最初的顶层设计没有接纳底层设计所指出和实践的路径,但底层并未因

① 对此类反对者观点的分析详见朱剑:《也谈社科学报的现状与改革切入点——答尹玉吉先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② 姚申:《多元化发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改革路径》,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③ 朱剑:《也谈社科学报的现状与改革切入点——答尹玉吉先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④ 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此而放弃自己的探索,不仅如此,在《实施办法》发布后,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所昭示路径的可行性,其加盟期刊由最初的17家几经扩容,已发展到现在的120余家,一级学科系列专业期刊也由最初的10种扩展为12种,并且成功开辟了由7种专题期刊组成的“专题系列”。中国学术期刊改革的底层设计仍然顽强地在坚持着自己的选择。

二、构建新秩序:两个维度的渐次展开

自2011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和“中央两办”发布《意见》正式启动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闻出版总署《实施办法》出台以后,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表现出了很大分歧,“这有点像两个要征服一座山的人,都认为自己选择的路是捷径,却无法说服彼此,这个时候明智的选择,或许是分别沿着自己的路向上攀爬,不管谁先爬到山顶,他们都是胜利者……看起来,这是一幅令人满意的和谐图景,然而这种‘视差之见’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和你一起登山的这个人,很可能不允许你尝试按你选择的道路攀爬,而强行命令你去走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上述‘视差之见’的意义也就全然失去了。因为,若多元性被一元性所压制,你根本无法作出选择、进行创造,即便是再独特的视野和跨越性的反思又能怎样呢?”^①当我们回顾2011年7月后几年的改革历程时可以看到,顶层设计虽然没有吸纳底层设计的方案,但并没有阻止底层继续进行探索性的尝试,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自发的转型尝试与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基本在两个维度进行。

(一)启动后的改革:两个维度,两种顿挫

先看顶层设计的实施情况。《实施办法》自发布以来,迄今并未有实质性进展。顶层设计为何不利用其所具有的强制性来强力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呢?或者说,为何不让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别无选择地走上“转企”这条唯一的改革之路呢?这固然是因为作为改革对象的学术期刊界有理有据的批评和积极或消极的抵制,更因为作为顶层设计的《实施办法》本身的不完备而缺失了可操作性。

只需看一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具体情况就可明白《实施办法》规定的“路线图”之不切实际。1300余种学报,分布在1000余家高校之中,各刊的历史迥异,主办学校的科研实力悬殊,岂是一刀切地“转企”就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能够并入出版企业或本校期刊整体“转企”的能有几家?如果要强行推动,2/3以上学报的结局将毫无悬念——必然是退出,将2/3甚至更多的学报“逼入死路”,将其编辑逐出本行业,而即使勉强留下的学报也必然遭遇以下窘境:“一是学术期刊将与学术研究母体彻底分离,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人才流失无法避免,近年来学报推进编研一体化,使许多著名学者走入学术期刊编辑队伍,转企必定使他们选择离开期刊而回归科研队伍,这可能使学术期刊从此一蹶不振。三是高校期刊的门户壁垒无法打破,大型学术期刊集团并不能因转企而自然形成。四是市场化后得不到足够资助的期刊只能靠收费维持,提高学术质量只能是空想,市场混乱倒是可以想见的。五是与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必然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弹。”^②如果说,2/3以上的学报和编辑人的退出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生存下来的学报之处境理应远胜过改革之前,但可以预期的结果恐怕正好相反,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目的已完全背离,改革的合理性又如何体现?这样的改革有何意义?显然,按照这个“路线图”,我们无法攀上山顶。

再看底层设计的实施情况。高校学报转型进展也不顺利。如前所述,学报转型与体制改革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转型的任何进展都离不开体制的支撑。“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方案的设计就是以期刊体制改革的必然到来为前提的,特别对管理体制变革充满期待。鉴于主管主办制度不会改变,能否获得学术新媒体主体身份对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生存和发展可谓至关重要,故从创办之初就希望得到体制的明确认可。然而,由于体制改革未能如期进行,时至今日,数字学术期刊刊号仍未发放,甚至连什么样的主体有资格主办数字学术期刊都没有明确,而没有主体身份,又怎能完成专业化、集约化、

① 桑海:《“视差之见”与跨越性反思——近期高校社科学报改革讨论述评》,载《文史哲》2013年第2期。

② 朱剑:《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进学术期刊科学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2012年11月2日,未刊稿。

数字化的转型？因此，纵然没有发生禁止底层实践探索这样的事，但是缺乏顶层设计支持的底层设计也只能徘徊于半山腰。这是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之间只有目标共识而缺乏路径共识的必然结果。

虽然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但技术发展却没有停歇。如果说2011年“中央两办”发布《意见》时，学术期刊的突出问题是“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那么，自那时以来，随着数字化、体系化、集团化的国际学术期刊的大规模进入，开放获取运动的全面展开，新的办刊主体的跃跃欲试，移动互联网和手持终端的迅速普及，不仅使原来突出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且，更为严峻的问题又摆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纸本时代的“刊”与互联网时代的“网”之间的张力正在不断扩大，学术传播传统秩序已危机四伏。今天维系“刊”与“网”的张力不致破裂的唯一制衡力量就是期刊体制。但是，面对这种种新老问题，体制已尽显疲态：高校和科研单位的SCI、SSCI和A&HCI崇拜，优秀学术论文大量外流；著名高校无法创办研究需要的期刊，只得出人、出力、出钱创办本该属于中国却被迫将版权奉送给国际出版集团的“国际学术期刊”，或者创办不被体制认可的“以书代刊”的“非法期刊”——学术集刊；新的传播技术早已介入学术传播，但拥有独立信息源的学术新媒体却迟迟不能问世，诸如此类的不正常现象层出不穷，而这一切均与期刊体制的滞后有关。具体说来，就是准入和退出机制的极不合理：对于传统纸本期刊，准入难，退出也难；对于学术新媒体，准入、退出标准和程序一概付诸阙如。显然，体制改革的搁置并不能阻挡危机的到来，只会让危机变得更加深刻。

当我们审视纸本学术期刊中心地位还能维持多久时，大众传媒可为借鉴。“当前，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带来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新兴媒体发展之快、覆盖之广超乎想象，对传统媒体带来很大冲击……可以说，传统媒体已经到了一个革新图存的重要关口。”^①显然，仅给予传统媒体市场主体身份已难以应对互联网时代的严峻挑战，必须上升到国家媒体战略的高度加以应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央两办”2011年《意见》发布3年多后的2014年，关于媒体改革和发展战略的新的顶层设计出台了。

（二）顶层设计“2.0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1. 顶层设计“2.0版”之《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堪称迄今为止关于报刊改革规格最高的顶层设计。《指导意见》指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举措”^②。可见，“媒体融合的改革路径已经清晰”^③。在《指导意见》中，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的观念得到凸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把对技术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媒体融合已不仅是简单的不同媒介之间的共存，而是内容、渠道、平台、经营和管理各方面的全面融合。应该说，这是继“中央两办”2011年《意见》之后，对媒体改革的再启动。我们只需将两个《意见》作一简单对比就可以看到，在对传媒存在的问题、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阐述，在对改革目标、改革手段等诸方面的设定，两者最根本的不同是，2011年的《意见》还停留在纸本时代，纠结于媒体的身份问题，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指向单个的纸质媒体（报刊），尽管也提到了数字化，但数字化基本定位还在于纸本的副产品，新闻出版总署的《实施办法》尚未将互联网时代给予传统媒体的冲击以及新媒体的新样态考虑在内。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以纸本刊、单个刊为目标的发展规划都注定是落后于时代

① 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载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23/c1001-24930310.html>，2014-04-23。

②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全文概要》，载 http://politics.chinaso.com/detail/20141215/1000200032729061418612072662673151_1.html，2014-12-15。

③ 付长超：《改革路线图敲定 主流媒体迎来新纪元》，载人民网，<http://henan.people.com.cn/n/2014/0820/c351638-22042847.html>，2014-08-20。

的,任何以纸本刊、单个刊为目标的改革措施也注定是没有前瞻性的”^①。《指导意见》则完全立足于互联网时代提出问题,并指明解决问题的路径唯有媒体融合。

当然,不免有人会指出,《指导意见》所针对的并非学术传播,而是大众传播特别是新闻传播。的确如此。虽然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大众传播与学术传播除了传播内容有别外,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所遭遇的危机的表现却不相同。大众传播遭遇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了严峻挑战,大量受众流失。这种格局在学术传播领域似乎并不存在,虽然同样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搜集和阅读学术论文,但这些论文几乎都来自传统纸本学术期刊,严格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信息源的学术新媒体并不存在,纸本学术期刊仍控制着学术信息源。这种控制实得益于期刊体制、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其实,体制也曾赋予传统主流媒体对信息源的控制权,新媒体正是依靠新技术打破了这种控制,才使得传统媒体危机显现。而在学术传播领域,大众传播所曾经历的一切正在被复制,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的改革也终将进行,传统纸本学术期刊要想长期控制信息源已无可能。“要消除‘刊’与‘网’的张力,最好的办法就在于培育起更适应‘网’的数字新媒体,而媒体融合可以为新媒体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因此,媒体融合发展之于学术传播同样具有战略意义。”^②

2. 顶层设计“2.0版”之《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5年3月31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出版融合指导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指导意见》是针对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网络等所有媒体的,而总局和财政部的《出版融合指导意见》则是专门就出版业发布的,其总体精神与前者一致,在具体方案上则更加细化,共规定了六个方面的重要任务,其中与期刊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是“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加强重点平台建设”^③这两个方面。不难发现,《出版融合指导意见》也已将期刊改革上升到国家媒体战略的高度,所要进行的改革不再局限于出版单位的性质或身份,或者说不再是以单个媒体为中心的改革,而是涉及了出版的全方位、全流程,其中,国家级平台建设取代了单个媒体的改革而成为战略核心。值得重点关注的还有该文件关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的承诺。我们知道,重建传播秩序的核心是制度建设,而该文件规定,将制定“网络出版等新兴出版主体资格和准入条件”“加强信息网络传播权行政保护指导意见”等制度性的法规,这应该引起学术期刊界的重视,因为它们与学术新媒体的诞生直接相关。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果能合理地制定并及时出台,不仅能使期刊体制不再成为学术新媒体出生的障碍,而且还能催生学术新媒体。那么,坚守纸媒的学术期刊还能独立存活多久?可见,融合各类学术媒体的数字化聚合平台的建设已刻不容缓。

3. 顶层设计“2.0版”之《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

如果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财政部的《指导意见》是针对整个国家出版业的,那么,2015年2月,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则是专门针对高校学术出版的,而该文件的第二部分“着力促进高校出版工作改革发展”则是教育部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次就高校学术期刊改革问题联合阐明立场,宣告了在高校学术期刊改革问题上,最高行政主管和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已经一致,故其相关表述可以视为教育部与总局关于高校学术期刊改革最新的顶层设计。

《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改革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设计。首先,关于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推动符合高校实际的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探索建立期刊编辑部分散组稿审稿、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营模式。”其次,关于媒体融合,“高校应支持和推动出版单位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努力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支持出版单位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出版方式,推进管理过程数字化、内容生产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途径网络化,推动从单一产品形态向多媒体、复合出版产品形态,从产品提供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依托优

①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②朱剑:《学术新媒体:缘何难以脱颖而出——兼及学术传播领域媒体融合发展》,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③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广发[2015]32号。

质学术资源或优势出版平台,构建统一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化升级”。再次,关于高校学术期刊的特色发展与集约化、专业化转型:“鼓励高校出版走特色发展道路……鼓励同类型、同地区的出版单位开展联盟合作,共享出版资源和渠道资源,形成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优势出版群。要引导中小出版单位根据自身特点,科学合理定位,明确主攻方向,走适合自身发展的‘专、精、特、新’发展道路。鼓励高校综合性学报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型。”^①

如果我们将《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与2012年总署《实施办法》作一对比,即可看到,前者不仅是对以“转企改制”为高校学术期刊改革唯一路径的重大修正,而且在媒体融合、技术支撑、内容建设、平台建设、数字化升级、专业化转型、特色化发展等多方面阐述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的理念,对高校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作出了原则性的部署,而且,基于这一系列理念和部署,期刊体制改革与数字化转型终于结合在一起,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的意义。同时,我们亦不难看到,上述一系列改革创新理念正是来自于对底层设计的吸纳,这些理念均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设计之初即已明确提出的。笔者曾言:“学术期刊体制改革与数字化转型这两场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能否无缝地对接在一起,决策者的顶层设计与业界的底层设计能否完美地结合起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能否获得成功,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能否实现。”^②《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无疑昭示了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在目标与路径两方面的共识正在形成,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期刊改革和转型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互联网时代的学术传播秩序。

(三)底层设计“2.0版”:专域平台的构想

虽然改革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但从共识到行动再到愿景的实现,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高校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的未来发展战略。

1. 不可错过的窗口期

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大众传播领域媒体融合发展已有了一定的进展,与之相比,高校学术期刊尚未见明显起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新媒体的存在,然而在学术传播领域,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新媒体还不成气候,甚至还不存在,按照媒体融合的一般思路,融合根本无法着手进行。那么,是否坐等由其他办刊主体获得体制的许可创办了学术新媒体,然后再与之融合呢?这样的做法不免刻舟求剑。主流新闻媒体正是因为低估和忽视了新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才出现了今天必须面对的危机,媒体融合对主流媒体而言,是一种亡羊补牢,这个教训可谓深刻。

在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终将进行的大前提下,传统学术期刊独享体制保护从而得以维持“中心”地位的局面将难以为继,具有独立信息源的学术新媒体的问世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也正是因为体制改革虽已启动,尚未有真正进展,还没有其他主体获得准入资格,学术期刊还拥有十分难得的基本独占学术信息源的窗口期。因此,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利用好这个窗口期,主动开发学术新媒体,让媒体融合与新媒体成长同步进行。在这方面,学术期刊应该拥有充分的自信,因为有着其他“新兴出版主体”所不具有的核心优势——对学术信息源近乎垄断的控制。尽管“内容为王”是一个纸本时代的观念,在互联网时代,依靠新技术的新的传播渠道已渐渐显露“王”者之相,仅依靠内容这张“王牌”,已不能确保在竞争中获胜,但技术是开放而非垄断的,只要有能力、有信心、有资金都可以运用。所以,在开发学术新媒体方面,学术期刊完全可以做到拥有内容和渠道这两张“王牌”,故理应是最合适的主体。

2. 实现对“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超越

早在国家层面的媒体融合战略出台之前,“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实际上已揭开了高校学术期刊媒体融合发展之序幕。该系列期刊的创办,正是试图通过创办新媒体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和学术传播秩序的重建。但是,由于中国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的独特性,几乎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而试图解决的却是长期存在、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以及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大小,都是方

①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教科社〔2015〕1号。

②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案设计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加之体制的掣肘,这就在客观上使得这个方案不可能无懈可击;而在主观上,思维的惯性让我们构建新秩序的尝试总是从复制旧秩序开始。客观困难和思维惯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某些局限。虽然设计所面对的是互联网时代,但首先要针对的却是纸本时代高校学报的综合性、封闭性、分散性等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及体系缺失等一系列“体制病”。“尽管‘专业化转型’方案已经体现了纸质期刊和数字化期刊‘两条腿走路’的思路,但这更像是改革受阻时急中生智的对策,而不是从数字化趋势出发的主动选择,更没有摆脱以纸质刊为中心的纸质思维。”^①意识到数字化对学术期刊未来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与真正摆脱纸本思维而主动运用互联网思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除了因缺乏体制的认可而无法获得合法“身份”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技术上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终执著于“期”和“刊”。呈现给读者的仍是按期出版的“刊”这种仿纸本期刊的数字化副产品,数字化和互联网传播的优势并没有能真正发挥出来。二是合作没能推进到编辑出版的全流程。合作从困难最小的终端产品组合传播开始,这是明智的选择,尽管设计之初就有逐步过渡到全流程合作的预设,但循序渐进地推向前端程序的难度远远超过了设计时的想象,进展一直不大,这就使得编辑工作的中心无法真正转移到互联网产品上来,独立的学术新媒体也就难以真正生成。

我们无需讳言“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局限,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存在,但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它是新秩序的诞生必经的孕育阶段。正是通过这样的尝试,让我们找到了突破的方向和途径。诚如桑海所言:“只有深入理解新媒介,接受(移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才能挣脱学术期刊惯性思维的羁绊。”^②当我们站在互联网的角度来思考构建学术传播新秩序的问题时,“期”和“刊”这两个最具纸本时代特征的要素恰恰成了我们首先要突破的框框。突破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建构,而这个建构,当从传播秩序的关键——传播的基本单元开始。没有稳定的基本单元,就不可能有合理的传播秩序。

首先,必须实现对“刊”的突破。如前所述,“刊”是纸本时代学术传播不可拆解的基本单元,但“单位制”的多学科综合性期刊由于内容和结构的庞杂导致的学科和问题边界的模糊以及本身逻辑性的缺乏,已被期刊数据库轻易地解构了。仅靠装订才将不同学科或问题域的论文合在一起的纸本期刊在不再以纸张为介质的数字和互联网时代被解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期刊数据库,这样的期刊在互联网上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多学科综合性期刊已被实践证明不可能成为互联网时代最佳的传播单元。

当然,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的期刊数据库中,“刊”仍然是基本的传播单元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已完成了与学科发展配套的专业(专题)化、数字化刊群的建设,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化建构。如果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转型要走与此相同的路径,则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的期刊格局,另起炉灶,从开放的而不是“单位制”的专业(专题)期刊群建设开始。不管从期刊体制还是学界和期刊界能够承受的变革程度来看,这样近似于“休克疗法”的变革都是难以付诸实施的。所以,我们才说,中国学术传播新秩序的构建必定会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但是,期刊数据库中那些来自被拆解期刊的单篇论文,也不可能成为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期刊数据库虽然使搜集资料的难度大大下降,但鉴别资料价值的难度却在不断增强。无论用哪种方法进行检索,高价值信息都会受到垃圾信息的干扰。随着平台信息量的快速增长,阅读效率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③。期刊数据库的实践已证明以单篇论文为传播单元只能导致传播的无序状态。因此,从中国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在“刊”与“文”之外,寻找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最佳单元。

其次,必须实现对“期”的突破。周期性出版是纸本时代期刊的基本特征,它的存在主要是受制于印刷出版技术,出版周期的不断缩短正是对周期性出版局限的补救。这种补救做到极致,就是随时可以刷新,而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①桑海:“视差之见”与跨越性反思——近期高校社科学报改革讨论述评,载《文史哲》2013年第2期。

②桑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之未来构想》,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③仅以中国知网为例,在CNKI平台上,以单篇形式存在的文献规模十分巨大,达到了以亿计的量级:“总量10190万篇。文献类型包括:学术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工具书、重要会议论文、年鉴、专著、报纸、专利、标准、科技成果、知识元、商业评论数据库、古籍等。”参见中国知网网首页,http://www.cnki.net/indexv1.htm。

可见,对“刊”和“期”的突破主要是观念转变,技术已不成问题。

3. 专域:互联网传播单元的脱颖而出

在改革和转型的背景下,互联网时代信息聚合型学术传播平台的意义已毋庸置疑,什么才是其基本单元的问题却值得探究。寻找高校学报互联网传播的基本单元必须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其一,与学术共同体疏离的学报如何重建关系而真正回到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其二,如何实现从纸本出版为中心到以互联网出版为中心的过渡?因此,首先要通过平台基本单元的建设在学报与学术共同体、纸本与互联网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彼此的桥梁。

虽然以“刊”和“文”为基础,都无法构建互联网传播的基本单元,但我们应看到,在纸本时代,多学科综合性学报的内部结构并非简单的单篇论文的叠加,在“文”与“刊”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结构层次——专栏。在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之后,大多数学报所走的内涵式发展路径,都是以特色专栏为基点的。专栏的意义在于,其所对应的恰恰是学术研究中的学科域或问题域,故对学术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相对说来,较有学术影响的博客,其学科和问题边界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设定,论文组合都有着比较严谨的逻辑关系,期刊的特色和风格以及编辑的价值往往首先通过专栏来体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专栏之于综合性学报的作用是有限的,较小的容量、较窄的作者面和有限的编辑力量,使专栏无法脱离期刊而单独存在和传播,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形象和品牌,远不足以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心,故其影响无法与开放的专业期刊相比。尽管如此,专栏仍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中心。这就启示我们,专栏是纸本时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最有价值的“遗产”,如果能通过技术手段,让专栏加大容量、拓宽视野、强化编辑实力、打破校域界限、扩大作者队伍、加强与学术共同体的联系,并且赋予其独立的形象和品牌,那么,改造后的专栏就完全有可能回归学术共同体。当然,以纸本为中心,这一切都无法现实。但当我们再来观照互联网时代的聚合平台时就会发现,如果能编制出这样的专栏,聚合平台恰恰可以为其独立存在和传播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支撑。问题是,如何让纸本期刊的专栏成为聚合平台上的基本单元?

显然,单一期刊的某个专栏与聚合平台上对应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单元之间还是有着巨大落差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像“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那样仅将各刊拟发表的同类文章简单地按专业重组是不够的,因为每个即使学科域和问题域相同或相近并拥有一定的作者群的期刊专栏,也是互相隔绝的,其自然的叠加很难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只有从策划组稿到编辑出版全流程的融会贯通才能使编辑、期刊和学术共同体成为一个不可拆解的整体。要改变以单篇论文为单元的期刊数据库传播模式,重建互联网传播的基本单元,整合各刊资源的跨校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而这正符合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要求。因此,以专栏合作为中心,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转型就有了核心依托,而且,它完全有可能成为构建桥梁的基础。显然,改造后的专栏在形式、体量、稿源、编辑、制作等各方面已不同于个刊的专栏,故我们将之称为“专域平台”。可见,专域不再是某一刊的专栏,而是共建共有共享的新型平台。由此,我们就找到了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基本单元,通过它,我们可以重建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并实现由纸本出版为中心到互联网出版为中心的转型。

4. 专域平台的意义

对于以综合性期刊或小综合期刊(一级学科期刊)为主体联合构建的信息聚合平台来说,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域的学科边界和问题边界最为清晰,可以完美对应学术共同体,是最合适的共同体交流平台。第二,依托专域平台可以实现编辑与学科专家完美结合,专家可以组织学术研究,甚至引领学术研究,故以专域为单元的学术传播最具影响力。第三,专域平台最能体现编辑思想、编辑理念和编辑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专域平台最能发挥综合性学报的优势,以专域为中心的编辑出版工作能够在纸本期刊和互联网出版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具有融合发展的持续能力。第五,专域平台也是最佳跨校合作单元。第六,专域也是最适合平台化互联网传播的单元,最有利于即时刷新、互动和私人定制。第七,专域的协作可以完成类似于开放的专业专题期刊群(周期则为随时刷新)的体系,从而成为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新秩序的基点,办刊主体的同一和对学术信息源的共享最终必将导致传统学术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三、专域平台:通往学术传播新秩序之路

如果说《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了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主要体现在原则性地确立了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但作为一个战略,还远没有成型,进一步的建构和完善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其一,完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方略。体制改革的核心应该是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预见的是,从顶层设计来看,主管主办制度是不可能改变的,所有的关于新体制的设计都不能脱离这一前提。即使在这一前提下,管理体制改革仍然可有所作为,至少在学术期刊、学术新媒体的准入、退出及日常管理的方法和机制的设计上,可以让改革后的体制能够做到尊重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以及学术新媒体的发展规律,尽可能地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如此,也就可为高校学术期刊的转型和发展、学术传播新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一个较过去好的制度基础。其二,新型学术传播平台的构建方案。在主管主办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学术传播秩序的重建,实际上首先就是要建构一个能够取代纸本时代学术期刊的纵向管理的“底层”与横向传播的“中心”的新基点,因此,战略的落实还在于作为新基点的平台将如何构建。这个平台需要尽可能地集数字化、专业化和集约化于一身,并且通过平台建设重新规约学术媒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使平台不仅是传播的中心,还是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即使管理体制有所改革,这个平台在体制上仍将是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让平台实质上回归学术共同体,更是一件充满挑战性的工作。鉴于制度设计更多地属于顶层设计,在此,笔者提出一个关于平台建设的基本构想。

(一)“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的构想

1.“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的基本构架

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联结作者、编者与读者的聚合型平台,暂定名为“超云”。其基本构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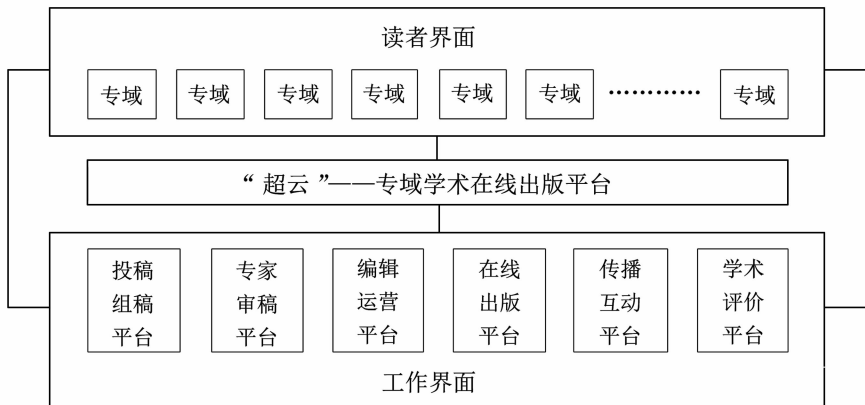


图 1 “超云”——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示意图

首先,从阅读界面来看,构成“超云”的基本单元是专域,专域本身就是一个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小平台,在理论上,有多少个可以划分的学科和问题域,平台上就可以有多少个专域,供读者任意选择订阅。其次,从工作界面来看,它又由六个子平台所组成。再次,根据功能的不同,各子平台与专域有不同的连接方式。每个专域和子平台均根据需要分别开设有作者、编辑、审稿人和读者的专门入口,实现阅读与工作(如投稿、审稿、评论等)以及作者、编辑、审稿人、读者的互动,从而实现“超云”的各种功能。

2.“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的理念与原则

作为一个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互联网时代信息聚合型的学术平台,理应执守符合互联网思维的以下理念和原则。(1)开放。开放加入,平台对所有学术期刊开放,亦即对所有作者开放;开放获取,平台传播的信息不设任何条件地对所有读者开放;开放评论,审稿意见与论文同时发表,并开放评论,读者可以对平台所发表的论文和作为发表依据的审稿意见进行即时评论。(2)互动。作者、编辑、审稿人、读者可以通过开放评论在线对话,实现真正的互动。(3)协同。加入平台的期刊组建期刊联盟,形成编辑

共同体,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和编辑间的协同同时展开,从投组稿平台到评价平台编辑与学术共同体全流程合作,通过协同合作,充分发挥集约化的优势,形成规模化的效应,并使体制上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平台实质上回归学术共同体。(4)质量。建设各专域审稿专家库,通过统一的审稿程序和标准,实行严格的入口端质量控制。(5)规范。建立平台合作的组织架构以及各项制度和规范。(6)服务。确立为作者、为读者、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的理念。(7)评价。建立学术共同体、编辑、评价机构全面合作的新型评价机制。奉行以上理念和原则的“超云”将是对“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超越和发展。以上理念和原则在“超云”的六个子平台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二)“超云”六个子平台的基本功能

1. 投稿组稿平台

投稿平台向所有期刊和作者开放。作者一次在线投稿,即可选择已加入平台的所有期刊或指定其中部分期刊,彻底告别一稿多投所引起的问题和诟病,必将极大地提升投稿的效率,建立起作者与期刊互信而紧密的关系。凡被作者选中的期刊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完成在线初审,有录用意向的期刊可直接送审稿平台专家审稿。专家审稿通过的文章送编辑平台。专家审稿需要退改的文章由送审期刊连同审稿意见退作者修改。作者可随时登录平台查看初审和专家审稿进度。经过一定时间无期刊有录用意向的文章自动退给作者。以专域为依托,期刊可单独亦可联合举办学术活动,并在平台发起组稿和讨论。

2. 专家审稿平台

以专域为单位建设统一的审稿专家库。审稿专家库以开放的形式构建,凡近年内在本专域有重要学术成果的学者进入候选名单,在征得该学者对审稿专家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同意,即承诺按照统一标准和程序进行公正地审稿后,进入审稿专家库,并由期刊联盟发给统一聘书。稿件由拟录用期刊送审,审稿专家可在线审稿并提供书面审稿意见。不管审稿意见是否有利于作者或发表,送审期刊负责支付不低于最低标准的审稿费。审稿费标准由期刊联盟统一制订。如审稿通过,论文发表时,将连同审稿意见一并发表。审稿专家可选择匿名或实名公布审稿意见。对审稿意见,读者可以在线评论。审稿平台的建立将确保进入平台论文的质量,并对审稿是否公平进行民主监督,并推进研究的深入。

3. 编辑运营平台

编辑平台分为“加盟期刊编辑部(杂志社)工作平台”“产品运营平台”两部分。前者为每个编辑部提供完整的在线采编系统,包括来稿阅读、作者背景信息、相关文献信息、学术不端检测、提交审稿专家、复审、终审、退稿、在线编辑、自动校对等编辑加工辅助功能。“产品运营平台”则为专域编辑、传播工作提供支持,包括稿件的上线、修改、删除、隐藏、重点推荐、配图、撰写导读、互动评论管理、人工推送管理、网站运营管理等。每个专域都设置编辑,必要的还可设置学术主持人。

4. 在线出版平台

通过系统自动分析辅以人工干预,设置一系列学科或问题边界清晰的专域。各专域汇集到统一的数字平台,按学科分类,按不同参数分别列序。不再按“刊”的周期出版,随时刷新。专域内的文章新上传列最前,旧文读者可选择按各种参数列序(上传时间、作者姓名、作者单位、主题、关键词、下载量、被引数等),同时开通链接和索引等功能,为读者提供各种阅读和研究所需要的服务项目。在专域平台获得独立出版资格之前,纸本期刊是在线平台能够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依托。通过纸本期刊与在线平台共享信息源实现以学术期刊为主体的学术媒体融合发展。

5. 传播互动平台

以专域为单元的个性化私人定制,可能是未来期刊的主打形态。其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由用户选择订阅自己感兴趣的专域,组合成独一无二的个人专属期刊。二是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用户偏好分析,由系统生成推荐定制期刊并定向推送。在线平台将通过电子邮件、APP、微信等方式,向用户发送这种经过个性化组合的期刊,学术信息将由此进入学者和学术大众的日常生活。平台产品内容可以同时提供 Windows 版、Mac 版、ipad 版、iphone 版、安卓版,同时开发 APP 软件,同步经营微信公众号等等。通过多屏互动,实现全媒体传播。

6. 学术评价平台

如今学术评价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简单化、唯量化和“以刊评文”。学术评价应回归学术共同体虽然已成共识,但自律而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远未形成。缺乏学术民主基础的同行评议难以担负起评价的重任。专域平台的构建将为学术民主建设提供基础,平台的开放性和学者的广泛参与为公正、公平、公开的学术评价创造了条件,有可能形成学科专家、期刊编辑、读者群体、评价机构共同参与的开放的学术评价机制。学者、编辑和读者可从专业、传播和社会影响等不同的角度评价平台所传播的论文;评价机构则可以通过平台抓取更有价值的评价数据为学术评价服务。如此,可望终结“以刊评文”,让论文成为学术评价的直接对象,而同行评议也有望重建公信力^①。

目前,高校学报正在行动之中,以“专域”为单元的大型开放互动学术传播平台已呼之欲出,我们将以此来打开通往学术传播新秩序之路。

Constructing of the New Order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Tak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s as the Center

Zhu Jian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e are in the era of media change. On the one hand, with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the periodical database platforms of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no longer take journals as the basic unit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while the rise of open access movement(OA), the “invasion”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cross-border intervention of the emerging group, destroyed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rder, increase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especially the comprehensive academic periodicals.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serious lag of periodic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without a suitable instead of traditional journals as the basic unit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rder in the Internet age does not naturally form. To build a new order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f the Internet age,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publication, groupage a large number of academic journals, initiatively achie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as the subject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empowered by the current system, and win advantages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reform in the coming future. At present,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s have in action. After Specialized Series of University Journals in China, a large open and interactiv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s ready to come out, which is expected to open the door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rder in the Internet ag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order; academic journal; periodical syst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pen access; special field publication

●作者地址:朱 剑,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 南京 210093。Email:zhujian@nju.edu.cn。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4YJAZH116)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2015年4月,在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暨‘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文学学报》研讨会”上,笔者提出了关于“专域平台”的最初设想;5月,在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方式研讨会”上,笔者再次提出这一设想及六个子平台的基本构架方案。此后又与蒋重跃、仲伟民、叶娟丽、崔月琴、原祖杰、洪峻峰、桑海等同仁多次开会讨论这一方案,并在微信平台上与更多的学报同仁共同讨论了这一方案。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特别感谢桑海对平台作了具体设计,并以《在线学术平台框架思路》为题,于2015年6月在武汉大学会议上对平台进行了详细讲解,本文对部分子平台的论述参考了桑海的相关讲述。